

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热烈的讨论。然而，这一历史的拷问是否也应该激起中国学术界的深入思考呢？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国家密切相关，而国家问题的研究却奇怪地被中国学者所忽视。我们是否仍然沉浸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知识精英对 19 世纪世界认识的迎拒迷思之中，让国家在想象中继续迷失，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迷失的国家找回来？应该说，要找回中国现代化国家的迷失，必须从认知观念上有所改变，至少应该像我们的一些西方学者的同行们那样，增强我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了解，更贴近和重视中国的经验，提出我们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人文关怀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业已被西方学术同行提出的问题设置：中国不是现代的边缘者，中国是现代的一部分。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习，还有很多新的问题设置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做出回答。

——2016 年 7 月 17 日

【编者按】

“多元文化主义”是国际种族/族群研究和国内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中心话题，各族群（民族）之间存在许多差异、特别是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这是普遍现象。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对这一点人们已有共识。但是从族际共存与发展的长远进程和最终目标来看，如何认识群体间文化差异的现状？如何引导这些群体差异在未来走向一个和谐共处与健康发展的方向？这是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

俞正声主席在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中增强共同性、包容性**，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要坚持**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要正确认识交融，切实尊重差异，逐步缩小差距。……**尊重差异不等于固化差异**。……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民族交往交流的增多，会极大地促进交融，这是历史趋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坚持社会主义属性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文明前进的必然结果。……要尊重规律，把握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而不能忽视民族共性放弃引导，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忽视民族差异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

《世界民族》2016 年第 3 期刊登了一篇论文，通过“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社会的具体实践讨论了这一极具政治争议性的议题，提出的一些观点具有启发性。由于该文篇幅较长，我们在这里只选了第五部分“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和第六部分“结论”，与大家分享。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杂志的全文。

（马戎）

【论文节选】

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的成与“败”¹

韦平²

五、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讨论和反思

¹ 全文刊载于《世界民族》2016 年第 3 期，第 1-12 页。

² 作者为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 讲师。



在实践中，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意味着鼓励每个移民群体珍视自己的少数族群身份，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因颂扬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而具有了价值。移民族群利用多元文化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地位，政府则将之作为促进移民融合的工具，并在其名义下将族群冲突置于可控范围之内。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局限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实施几十年后，其本身或附带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而且反对之声也从未沉寂过。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之时，穆斯林为自身宗教诉求而进行的族群动员则暴露了宗教多样性在制度安排上的不完善。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系列论战，代表性的事件有1987年的哈尼福德事件（Ray Honeyford）¹和1989年的拉什迪事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1988年出版了《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但此书招致了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抗议，最后此事发展成来自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群体联合起来的全国性运动。拉什迪事件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转折点，它将伊斯兰教推到了公共舆论的中心，并打破了英国多元文化模式的光环。自此之后，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反思和质疑之声渐长。2011年首相卡梅伦甚至公开宣布，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个失败，这引发了从学界到政界的一片哗然。统而言之，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否是一种反整合的方式？对于当代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少数族群因为多元文化主义而可以随意保持自己的差异，形成一种平等但隔离的“平行的生活”（parallel lives）²。这不利于国家认同和国家凝聚力的塑造。多元文化主义倡导对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但在实践中却在某种程度上强化或“合法化”了“飞地意识”，使文化差异的概念固化，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族群间的交流，使得政策调节的空间越来越小³。不过也很难绝对地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是族群融合和国族整合进程的一部分，毕竟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初衷是促进族群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是否破坏了英国价值观？西方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被定义为中立和普世的，而所谓的英国价值观包括一系列含义，如言论自由、个人安全、民主、平等、公正。某些移民文化中存在的男权主义特权、对女性的隔离和剥夺女性权利，强迫婚姻或包办婚姻、宗教机构超越世俗政权权力等现象，这些都有违英国价值观。似乎如果认可和接收这些文化，就是违背自由民主的英国价值观。不过那些包含在英国价值观中的言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理念同样存在于移民族群中，并不像很多白人想象的那样有隔阂，也很难说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就会破坏英国的价值观。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各种衍生物是否能代表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对其理解也仍然是各有不同。“不违法就可以为所欲为、文化间相互理解和包容就能使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消失”的想法被形容为“天真的”多元文化主义。考虑到国家认同、民主、自由价值观，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同时不接受与世俗法律重叠的宗教法庭，这些考量繁复的想法被形容为“复杂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虚伪的”多元文化主义一派看来，多元文化主义仅仅是主流社会应付移民的一种方式，是英国公共政策中妥协态度的表现，是政治分歧双方折中的方式，甚至只是“装点门面”的想法而已。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虚弱”一词来形容英国的多元化主义政策，因为它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文化上，而未触及到深层次的机构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僵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将文化视为静态的、有界限的，很少考虑族群间的相互影响。“将

¹ 1982年至1984年间，雷·哈尼福德（Ray Honeyford）给《泰晤士报》和布莱德福德当地的一家报纸写信，并在《索尔兹伯里评论》（*The Salisbury Review*）上发表文章讨论族群性、文化和同化在移民子女的教育中的表现，批评了他认为学校教育中不当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对教科书“政治正确”的审查形式。他的观点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讨论。

² 在对2001年英格兰北部骚乱的诸多调查中，有人提出了“平行的生活”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布莱德福德等地穆斯林族群与白人族群间既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又互不往来的生活状态。这个提法在对国家政策转变起到重要作用的《坎特报告》（*Cantle Report*）中得以认定，之后被学界、政界广泛引用。

³ Ted Cantle, *Interculturalism: The New Era of Cohesion and Divers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32.

任何问题都简单归因到文化差异上，对本可以解决的问题置之不理”的被称为“不负责任”、“滥用的”多元文化主义。这些都是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不同解读，它们不同程度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有时甚至违背了初衷。另外，政策的制定者也没有将多元文化主义的含意解释清楚，预留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凡此种种，都让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执行更加难以控制。

第四，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否被滥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政府将移民族群作为政策的协商对象，并对移民群体进行一定的资助，这本是扶持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群的方式，但却导致社群领袖将文化作为交换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差异存在的广度和深度变成了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少数民族群自身的重要性通过它们体现，也因此获得更多资源。换句话说，移民族群有可能将这种差异性作为拒绝融合的筹码，来获得资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多元文化主义仅仅关照每一个特殊的、隔离的群体，而不是面对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形成某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状态。使得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因此被强化，在各少数民族群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增强的同时却导致了各族群间更大的疏离，从而又进一步增强了少数民族群的政治资本和议价能力，由此又形成了一个不利于民族国家统一和国族认同建构的恶性循环。但以此而彻底否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似乎也有些以偏概全。

第五，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是否只为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由于英国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最易受到牵连的移民族群再次成为替罪羊，而强调保留移民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自然无法逃脱攻击。所以，谴责多元文化主义是政党的政治需求与公众的经济需求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可以有效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为各种未能妥善处理的问题找到了归因，使得业已存在的复杂的社会阶层和新自由主义重构带来的消极影响得到了掩饰；另一方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也可以迎合一部分民众的仇外心理。

第六，政策的落实程度和实践是否能忠实反映其指导思想？在很多人眼中，英国已经是一个从内到外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国家，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他们认为政府在促进白人群体理解和接受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有限，特别是与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白人群体的努力相比更是如此。另外，公众领域中存在的种族歧视思想从未消失过，而且有强大的保守主义媒体为之巡护。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被公平地执行？对于这个问题，在尊重欧洲内部各种文化差异的方面或许是令各方都很满意，但在对待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其他文化时，则争议就很多了。

六、结论

英国的移民融合政策经历了从同化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变化，而且未来有回归同化的趋势。不论同化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对不同群体共同生活模式的尝试与探索。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英国被正式宣布为失败，连多元文化主义的领军人物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都承认现在进入了一个后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¹。如果从上世纪下半叶的种族歧视状况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改善种族关系、推动移民族群的社会地位、促进英国各种族间和睦相处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曾做出过很大贡献，是适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的。但是进入21世纪后，它却备受争议。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存在着政策理念上的贯彻问题，造成了在实际操作中对其不同的解读与理解。面对少部分穆斯林群体的融入不力，英国政府就宣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却忽视了更多移民族群还是能较好地融入英国社会这一事实。然而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上，融合政策却也很难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真正一刀两断。虽然近些年来政府对原来的政策做了调

¹ Will Kymlicka, 'The Rise and Fall of Multiculturalism? New Debates on the Inclus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Diverse Societies', in Steven Vertovec, Susanne Wessendorf, *The Multiculturalism Backlash: European and Practi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m p. 32.



整，比如过去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比较倚重少数族群的社群领袖，往往要请他们参与协商。但卡梅伦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后，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式并没有彻底变革，只不过将咨询对象变成了穆斯林社群的领袖，而且过去资助少数族群开展自己文化的方式，也相应变成了对穆斯林等宗教团体的资助。从这个角度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非被抛弃，而只是将其主要对象从族群移向了宗教社群。虽然多元文化主义被英国政府“认定为失败”，但是这种认定在理念和现实中也还存在很大争议。所以也就无法简单地用“失败”来涵盖这样的复杂情况，不过总体看来，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

现在，印度特色美食“提卡玛沙拉鸡块”能代替英国国菜“炸鱼和薯条”而成为英国大街小巷中最普遍、最好卖的美食。这是多样性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典型例证。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融合方式一度是欧洲移民融合的典型模式，可以说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就业、教育、宗教等领域都得到较好的发展，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此不可否认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带来的进步和成就。但其所被诟病的——世纪之交的种族骚乱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不可控，是多元文化主义埋下的种子¹，也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28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世纪之交以来英国的移民融合政策逐步进入共同体凝聚（Community Cohesion）阶段，而推动政策转变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2001年英格兰北部骚乱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产生归因于文化因素，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参见Ronny Flynn and Gary Craig, “Policy, Politics and Practice: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its Relevance to Current Debates”, in Gary Craig, Karl Atkin and Sangeeta Chattoo, *Understanding ‘Race’ and Ethnicity: Theory, History, Policy, Practice*, Bristol: Policy, 2012, pp. 83-87.

